

從述祖到揚己—— 兩周「器主曰」開篇銘文研究

黃庭頌*

摘要

本文主要針對兩周「器主曰」開篇銘文進行歷時性研究，並在前賢研究基礎上提出新的見解。文章從敘述口吻、銘文結構、文本性質以及主題演變等四方面切入：第一，本文認為「器主曰」開篇銘文與其他銘文最大不同之處在於主述口吻，其不僅保留作器者之立場與心境，更自成一套較特殊的敘述方式。第二，這類銘文約在西周中、晚期發展出穩定結構，多由伐閱之辭、獻辭以及嘏辭所組成，春秋以後則由器主自報家門以及說明鑄器緣由兩部分組成，並延續至戰國時期。第三，就文本性質而言，本文主張西周時期的文本保留了禱辭本質，但考慮到銘文結構與用詞高度一致化的情形，可知其並非儀式進行當下所使用的祭告文本，而是經過重新編寫的版本，因此同時具備禱辭、頌辭以及製作動機之敘述。第四，呼應兩周社會的變遷，這類銘文也存在由「述祖」到「揚己」的轉變趨勢。西周著重器主藉由對家族祖先功績的重塑，以確立自身的職務與定位；兩周之際開始與其他銘文的交融與匯流，較顯著表現在敘述性軍事銘文選用「器主曰」開篇；春秋以後轉向宣揚器主，明確宣告其個人價值，雖提及祖先的自報家門格式，但較傾向藉釐清器主身分來歷以襯托其政治實力，而此時整體內容已與非「器主曰」開篇銘文未有太大差異。整體而論，

* 佛光大學中國文學與應用學系專案教師。

兩周「器主曰」開篇銘文的變化不僅涉及儀式、文本乃至於記憶的形成，更能見微知著地了解兩周宗法制度、社會結構、精神思想的變革。

關鍵詞：青銅器、銘文、器主曰、文本、儀式

一、前言

兩周青銅器銘文是研究先秦文字、歷史最重要的第一手材料，其形式主題變化與社會變遷之關聯，一直是學界較關注的問題。早前日本學者白川靜（1910-2006）即指出彝器文化乃是隨王朝秩序而展開，不同王朝會形成各自不同的祭儀形式，而出現相異的彝器文化，此種轉變不只見於器類組合，包括器種、器形、紋飾乃至於銘文內容都會出現相應的變遷。其更指出殷商的氏族制、西周的宗法制在本質上大抵相同，但是到了東周列國時期，由於舊有的政治秩序逐漸瓦解傾頹，因此彝器觀方面也開始產生變化。¹ 根據白川靜說法，青銅文化之改變往往受到政治秩序影響，藉此論之，若透過研究銘文內容之演變，亦可進而觀察社會或思想文化的變遷。本文認為欲達成此研究目的，可先尋找一類格式相對穩定、發展時間長且數量夠多的銘文類型，按照時序加以觀察，並進行分析，方可看出從西周到東周銘文主題的變化脈絡，而兩周俱見的「器主曰」開篇銘文正是合適的研究材料。

「器主曰」開篇銘文乃指開頭見「器主曰」三字格式的銘文，《說文》：「曰，詞也」，²「曰」字之後乃是紀錄說話者的言辭。這類銘文以「器主曰」開頭，其後紀錄器主的言辭，展現由器主立場敘述的情境內容與文本框架，與一般由史官代述的銘文有所不同，具備一定的特殊性。由於「器主曰」銘文的數量不少，格式穩定且出現時間橫跨兩周，加上內容方面隨時間而略有變化，不僅自成一套較獨立的體系，更反映銘文如何在特定格式下因應時代與社會變遷，而產生不同的內容樣貌，對於理解兩周時期銘文用語、觀念、敘述立場等演化，

¹ 〔日〕白川靜，《白川靜著作集·別卷·金文通釋5》（東京：平凡社，2005年），頁10。

²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頁204。

具備一定的重要價值。

以往研究過「器主曰」開篇銘文的學者共有三人。最早是裘錫圭在〈戎生編鐘銘文考釋〉一文中指出過去所見的西周銅器銘文中，以器主「曰」開頭的例子是屢見的，如〈虢方鼎〉以「虢曰」開頭，〈師望鼎〉以「太師小子師望曰」開頭；〈大克鼎〉以「克曰」開頭；〈禹鼎〉以「禹曰」開頭；厲王（890-828 B.C.）所作的〈猷簋〉以「王曰」開頭；〈癩鐘〉及〈癩簋〉以「癩曰」開頭；〈虢叔旅鐘〉以「虢叔旅曰」開頭；〈梁其鐘〉以「梁其曰」開頭等。但先記時接著以器主「曰」引出銘文之例，過去卻只見於東周銅器銘文。除〈晉姜鼎〉外，還有〈晉公盞〉、〈邵鐘〉、〈蔡侯申鐘〉及罇、〈陳助簋〉、〈陳逆簋〉、〈配兒鉤鐃〉、〈三兒簋〉、〈哀成叔鼎〉、〈陳侯因資敦〉等，而春秋之際的〈戎生鐘〉和〈晉姜鼎〉銘文開頭都先記時，接著以「某某（器主名）曰」引出銘文。³ 大致而言，裘錫圭提供了一個很重要的觀察，亦即「器主曰」銘文格式從西周到東周之間存在些微的改變，原本僅有「器主曰」三字開篇的銘文慢慢發展出「記時+器主曰」的新格式。不過由於裘氏並未針對這系列銘文作進一步的討論，因此「器主曰」開篇銘文成為後來學者可以再深入開展的課題。

其後關注此課題之研究者為何樹環，其於〈讀逯盤銘文瑣記〉一文提及「器主曰」開篇銘文的特殊性，且較全面的蒐集相關例子，試圖概括這類銘文特點。其指出這類銘文即是在「某曰」之後，先稱述其先祖，然後往往有述及自身遵循、效法祖先功德的文句，之後言其所成就的事功，而這樣的特點在不是以「某曰」開頭的銘文中，幾乎是看不到的。⁴ 何氏進一步認為具備這種特點的銘文很可能就是「頌」

³ 裘錫圭，〈戎生編鐘銘文考釋〉，《裘錫圭學術文集（三）·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04。

⁴ 何樹環，〈讀〈逯盤〉銘文瑣記〉，《文與哲》第3期（2003年12月），頁12。

這類文體，銘文所記載者或許就是當時宗廟中頌辭的忠實呈現。⁵ 不過同樣對「器主曰」開篇銘文做過研究的陳英傑並不認同這種觀點，其以為即便不是以「某曰」開篇的銘文，也很可能是宗廟的頌辭，而且這類形式的銘文存在一個發展過程，並不能將西周與春秋戰國的銘文一概而論。⁶

有鑑於此，陳英傑根據西周這類銘文都具備稱揚先祖之功德，並表明自己要帥型祖考德或威儀的共同特徵，認為其製作動機乃是來自器主開始世襲父祖之官爵或是重新接受天子冊命而作的祭告宗廟之器。⁷ 除此之外，陳氏亦考察這類銘文寫作格式在兩周的變化，指出西周時期一般是先稱頌近世祖考，然後表明自己「肇帥并祖考之德」的決心，並言明自己承擔的職事；兩周之際甚至是春秋早期，則是轉變為稱頌始祖、始封之君或是氏族發展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祖先；到了戰國時期，寫作格式雖延續春秋的「記時+器主曰」，但已無法確知是否為初次即位之作。而且此時多言明器主為某之子、某之孫或某之父、某之臣，無非是顯耀自己尊貴的地位和出身。此舉雖與西周稱頌先祖有著淵源關係，但目的已隨時代變化而有所不同。⁸

根據前賢研究的成果，可知過往大多聚焦於兩大課題，亦即格式演變與文本性質的探究。格式方面自裘錫圭提出從「器主曰」到「記時+器主曰」之後，何樹環進一步指出稱述先祖、效法祖先功德的文句，而陳英傑則更細緻地觀察到東西周稱述方式的變化；文本性質方面，目前則有類比為「頌」、初次襲爵或重新冊命的兩種不同觀點。本文將採取歷時性分析的研究方法，首先主張「器主曰」開篇銘文與

⁵ 何樹環，〈讀〈迷盤〉銘文瑣記〉，頁 13。

⁶ 陳英傑，〈兩周金文「器主曰」開篇銘辭研究〉，《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9 年），頁 819。

⁷ 陳英傑，〈兩周金文「器主曰」開篇銘辭研究〉，頁 819。

⁸ 陳英傑，〈兩周金文「器主曰」開篇銘辭研究〉，頁 831-832。

其他銘文之差別在於主述口吻，其內容是一種包含禱辭、頌辭或是製作動機，並經過精簡濃縮後的祭告文本。其次藉由觀察銘文內容、製作動機與寫作格式的演變，證明「器主曰」開篇銘文不僅比一般銘文更能反映作器者的思想觀念與編寫選擇，更涉及兩周思想觀念的演變，乃至於一個從述祖到面對讀者的轉化過程。針對上述的問題，本文將避免就孤立的歷史背景，討論個別銘文指涉的事件或與器，而是爬梳儀式、文本到銘文間的發展關係，並進一步探究兩周社會變遷過程以及文化記憶（das Kulturelle Gedchtnis）⁹ 的形成。

二、西周早、中期：主述口吻的形成

西周前期較具特色的「器主曰」開篇銘文共有五篇，分別為〈易旁簋〉（4042-4043）、〈孟簋〉（4162-4164）、〈叔隤父卣〉（5428）、〈沈子它簋〉（4330）以及〈或方鼎〉（2824）。西周早期的〈易旁簋〉與〈孟簋〉都是在記述一次賞賜事件，〈易旁簋〉銘文「易旁曰：趙（遣）弔（叔）休于小臣貝三朋、臣三家，對卑休，用作父丁尊彝」，¹⁰ 此「小臣」即易旁，遣叔當是其上司，藉由賞賜事件表現出遣叔與器主的隸屬關係。¹¹ 與之相似的銘文亦見不以器主曰開篇者，如〈小臣（或）

⁹ 「文化記憶」涉及的是人類記憶的一個外在維度。當社會交往出現了過度膨脹的局面，隨之要求產生可以起中轉作用的外部儲存器。社會交往體系必須要產生出這樣一個外部範疇：它可以使需要被傳達的、文化意義上的信息和資料轉移到其中。伴隨這個過程產收的還有轉移（編碼）、存儲和重新調出（再次尋回）的一些形式。在文字發明以前，文化記憶基本上與社會集體中流通著的記憶一致，但在文字發明以後，社會交往的外部範疇才可能成為自主、成體系的存在，並超越原本正在流通的社會交往層面，真正產生這樣一種記憶。詳見〔德〕楊·阿斯曼（Jan Assmann）著，金壽福、黃曉晨譯，《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頁4-17。

¹⁰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三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1年），頁249。

¹¹ 關於〈易旁簋〉的敘述方式，陳英傑曾做過探討。其指出這類表達隸屬關係的口吻，尚見

鼎〉(2556)「召公建匱(燕),休于小臣𠄎貝五朋」¹²〈爰簋〉「佳五月乙亥,相侯休于𠄎臣爰,易(賜)帛金」等等,¹³似乎無論是否以「器主曰」開篇,均不影響內容。然而〈孟簋〉銘文卻有些許不同:「孟曰:朕文考眾毛公、遣仲征無需,毛公易(賜)朕文考臣,自𠄎(厥)工(功),對揚朕考易(賜)休,用宣茲(茲)彝,乍(作)𠄎(厥)子子孫孫其永寶。」¹⁴內容是記述孟的父親與遣仲、毛公前往征討無需,其父因戰功獲得毛公賞賜,孟為紀念此事而作器。這篇銘文特殊之處在於器主本人並未參與文中所言之事,僅僅是從一位子孫的角度追述。¹⁵此種作器者非受賞者的情況幾乎未見於西周早期其他銘文,本銘之所以採用「孟曰」開篇,或許正與器主立場與一般銘文不同有關。

〈叔隴父卣〉則是西周前期敘述口吻相當特殊的一篇銘文,內容記述叔隴父欲將此卣交予族內晚輩罔,並希望罔用於服侍上司、出入事人,期盼他能敬慎穩重。銘文以「叔隴父曰」開篇,內文「余考不克御事」、「余貺為女(汝)茲(茲)小鬱彝」、「烏虜,罔敬哉」等語氣不僅少見於同時期銘文,更呈現出一種長輩勉勵後輩的期許之情。¹⁶〈叔隴父卣〉此種展現器主自身立場與細微心境的敘述口吻,與一般銘文由史官代為敘述的口吻不甚相同,故本文稱之為「主述口吻」。此種主述口吻亦見於西周早期〈沈子它簋〉與西周中期〈戮方

於〈天君簋〉「我天君鄉飲酒,賞𠄎征斤貝」、〈濼事鬲〉「姁休易𠄎濼事貝」、〈爰簋〉「相侯休臣爰」等等,只不過〈易旁簋〉於「小臣」前未用「𠄎」字而已。陳英傑,〈兩周金文「器主曰」開篇銘辭研究〉,頁 820。

¹²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二卷》,頁 267。

¹³ 《集成》器名作〈相侯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三卷》,頁 290。

¹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三卷》,頁 305-306。

¹⁵ 彭裕商認為此器可能是孟的父親未及作器便去世,故由其子孟代為作器。見彭裕商,〈西周銅簋年代研究〉,《考古學報》2001 年第 1 期,頁 7。

¹⁶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四卷》,頁 170-171。

鼎》，為方便討論，以下羅列銘文內容：

它曰：拜稽首，敢眔昭告：朕吾考令乃鵬（？）沈子作弔于周公、宗陟二公，不敢不弔。休同公，克成妥吾考，以于尹顯顯受令。烏虜！隹考眔敏，念自先王先公，迺妹克卒告刺成功，且吾考克淵克，乃沈子其顧懷多公能福。烏虜！乃沈子妹克覿見馱于公，休沈子肇斲_斲賈_賈。作茲簋，用飗饗己公，用恪多公，其孔哀乃沈子它唯福，用水霑令，用妥公唯壽，它用懷_懷（佐）我多弟子、我孫，克又型斲，懿父迺是子。（沈子它簋，4330）¹⁷

戠曰：「烏虜，王唯念戠辟烈考甲公，王用肇使乃子戠率虎臣禦淮戎」。戠曰：「烏虜（乎），朕文考甲公、文母日庚，式休則尚，安永宕乃子戠心，安永襲戠身，卒復享于天子，唯卒使乃子戠萬年辟事天子，毋有眔（尤）¹⁸于卒身。」戠拜稽首，對揚王令（命），用作文母日庚寶尊鬯彝，用穆穆夙夜尊言孝妥（綏）福，其子子孫孫永寶茲烈。（戠方鼎，2824）¹⁹

〈沈子它簋〉以「它曰」開篇，然而由於銘文內容艱澀難讀，具體意義至今仍未能研究清楚，僅知可能是沈子它代新死之父向宗廟中諸先公所作的禱辭。²⁰ 至於〈戠方鼎〉則是一篇器主向過世父母祈求庇佑

¹⁷ 本篇銘文艱澀難讀，各家學者隸定、斷句各有不同，本文為方便討論，暫時採取通用字較多的董珊隸定版本。參見董珊，〈釋西周金文的「沈子」和《逸周書·皇門》的「沈人」〉，《出土文獻（第二輯）》（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頁29。

¹⁸ 此字舊釋為「尤」，其後陳劍改釋為「愍」，林宏佳主張釋「擇」，本文暫從舊說。相關討論參見陳劍，〈甲骨文舊釋「尤」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甲骨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頁59-80；林宏佳，〈「尤」、「擇」辨釋〉，《成大中文學報》第27期（2009年12月），頁119-252。

¹⁹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二卷》，頁390。

²⁰ 劉雨，〈金文_饗祭的斷代意義〉，《金文論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頁195。

的祭告文書，其格式可分為三部分：第一段「**玆**曰」說明出征理由，第二段「**玆**曰」乃是紀錄祈求內容，第三段說明作器緣由。從**玆**的祈求「安永宕乃子**玆**心，安永襲**玆**身，畢復享于天子，唯畢使乃子**玆**萬年辟事天子，毋有**玆**（尤）」來看，是希望文考甲公、文母日庚的亡靈能使之於戰爭中安定身心，並順利侍奉天子，避免產生過錯。而從〈**玆**簋〉（4322）銘文「朕文母競敏**玆**行，休宕畢心，永襲畢身，卑克畢敵」可知，²¹ 器主**玆**從修辭上將其順利克敵制勝，歸功於文母日庚的庇佑，而非自己的武功。由於〈**玆**方鼎〉銘文主旨是向過世父母祈求戰事順利、安頓身心，不免令人聯想到《左傳》哀公二年（493 B.C.）衛太子蒯聩（？-478 B.C.）的禱辭：

曾孫蒯聩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蒯聩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²²

蒯聩也在出征前向過世的先公先王禱念，首先說明出征理由「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鞅討之」，其次祈求「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此種在開戰前祭禱之習慣尚見於《左傳》成公十六年（575 B.C.）的鄢陵之戰，楚莊王（？-591 B.C.）見晉軍「乘而左右皆下矣」，伯州犁告知此乃「戰禱也」。楊伯峻注云：「戰前禱告鬼神。」²³ 雖然蒯聩的祈禱目的乃避免於戰役之中受傷，以免令先祖蒙羞，與**玆**的安定身心追求略有不同，但兩者期望獲得祖先庇佑，安度戰事危險的心情，皆於銘文與禱辭中表露無遺。

²¹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三卷》，頁 454。

²² 〔戰國〕左丘明撰，〔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 年，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頁 996。

²³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臺北：源流出版社，1982 年），頁 884-885。

相對於非器主曰銘文的他述口吻，西周前期「器主曰」開篇銘文的主述口吻不僅較完整地保留作器者之立場與心境，〈沈子它簋〉和〈或方鼎〉更因祭祀場合而展露其禱辭性質。柯馬丁認為鐘、容器、斧鉞、石磬等禮器上的銘文，在整個周代都用於君王、貴族的宗廟祭祀，代表了祭祀活動文本性（textuality）的數個層面之一；文本性的其他層面，還包括儀式各個階段中獻祭的禱文、頌歌、正式的聲明。²⁴ 若從〈沈子它簋〉詰屈聱牙的語言風格來看，「它曰」之後所承接之文字極為可能是器主祭禱的言辭紀錄。至於〈或方鼎〉銘文相對之下顯得簡明扼要，文辭也較為暢達，似乎暗示著儀式當下存在另外一份內容更為完整、言辭更加口語的文本，而銘文則是經過精選的簡要版本。雖然兩者祈求目的不同，但顯然都是器主向宗廟祭禱時所使用的「儀式文本」（ritual texts），²⁵ 這類「器主曰」開篇銘文雖在寫作主題或背景方面，與其他祭祀銘文未見差異，然其所展現之主述口吻及器主心境卻是具備顯著的獨特性。

三、西周中、晚期：濃縮編寫的檔案

自西周中期〈癸簋〉開始「器主曰」開篇銘文發展出一種不同樣貌，不僅象徵此類銘文之格式邁入穩定狀態，更確立了此類文本獨特的敘述方式。目前斷代為西周中或晚期，內容較為完整且可供研究的「器主曰」開篇銘文共有九篇，包含〈癸簋〉（4170）、〈癸鐘〉（247）、〈師望鼎〉（2812）、〈虢叔旅鐘〉（238-244）、〈邢人妥鐘〉（109-112）、

²⁴ 〔美〕柯馬丁（Martin Kern）著，劉倩譯，《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頁55-56。

²⁵ 柯馬丁主張將銘文理解為「儀式文本」，即儀式上使用的文本。此種理解方式雖未必適用於所有的西周銘文，但是卻可以運用在〈沈子它簋〉與〈或方鼎〉兩篇銘文中。見〔美〕柯馬丁著，劉倩譯，《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頁134。

的規範化格式，基本包含三部分：第一部分通常為頌揚祖考威儀，第二部分言明器主將帥型祖考並作器予祖先，第三部分則為嘏辭。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觀察西周長篇銘文時曾提出所謂「伐閱之辭＋獻辭＋嘏辭」三段式結構，²⁹ 而此三段式結構乃是西周中、晚期長篇銘文普遍具備之特色，「器主曰」開篇銘文當是受到此主流發展趨勢之影響，因而形成與西周前期截然不同的樣貌。

如同羅泰所言，西周長篇銘文的基本結構大致遵循「過去－現在－未來」的模式，而「器主曰」開篇銘文第一部分就是屬於「過去」的伐閱之辭即是「器主曰」之後的頌揚祖先文字。例如〈癸簋〉稱頌高祖、亞祖、文考；〈師望鼎〉「丕顯皇考宄公」、³⁰ 〈虢叔旅鐘〉「丕顯皇考夷叔」稱頌過世的父親；³¹ 〈單伯奭生鐘〉「丕顯皇祖烈考」稱頌過世祖父，³² 〈邢人妥鐘〉、〈梁其鐘〉、〈叔向父簋〉、〈大克鼎〉則是稱頌過世的父親與祖父；〈逯盤〉更是花費近半篇幅細數七代以前的先祖功績，並經常使用「克明毕心」、「克慎毕德」、「得屯亡敗」等套語描述。雖說述祖之辭於西周長篇銘文中並不罕見，但值得注意的是，此類直接以「丕顯」稱頌祖先的方式幾乎不見於非器主曰開篇銘文，金文「丕顯」多見於兩種情況，一為「對揚天子／上司丕顯休」，另一則為周天子稱文王、武王為「丕顯文武」，³³ 而〈虎簋蓋〉（新收

²⁹ 羅泰認為幾乎所有現存的禮器銘文都是標準的三段式結構，這種結構本身反映了禮儀的過程。所謂三段式結構的長篇銘文即以「獻辭」為核心，然後接嘏辭，另外開頭有一段伐閱之辭。伐閱之辭指向過去，敘述作器者及其祖先的功績，經常（但也有例外）描述冊命儀式，銘文的這個部分顯示家族的地位和儀式中器物所代表的正統地位，通過延續正確無誤的禮儀，以證明祖先功績可以代代相傳。〔美〕羅泰，〈西周青銅銘文的性質〉，《考古學研究（六）》（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346-347。

³⁰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二卷》，頁378。

³¹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一卷》，頁211-216。

³²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一卷》，頁48。

³³ 「丕顯」二字不用於上述狀況者，目前只有三例：分別為〈伊簋〉（4287）「對揚天子休，伊用作朕丕顯文祖皇考倬叔寶簋彝」、〈番生簋〉（4326）「丕顯皇祖考，穆穆克慎毕德」以

1874) 雖非器主曰開篇，然銘文後段以「不(丕)顯朕刺(烈)且(祖)考彝明」稱頌祖先時，卻也在前方加上「虎曰」二字，由此可見以「丕顯」稱頌祖先應具較強烈的口述意味。³⁴ 這段述祖的伐閱之辭表示器主試圖藉由以訴說家族榮光歷史的方式與過去產生連繫，並強調家族職位與德業代代相傳之關係，更為其在該家族中所承繼的地位提供一個正當性論述。

第二部分為屬於「現在」的獻辭，在目前所見的九篇銘文中，除〈大克鼎〉外一律始於「率型祖先之德」之句，其後描述器主需承擔的工作內容，部分銘文會提及器主之嗣位也受到天子的賞賜或認可，最後結束於「用作祖先寶尊彝」。從獻辭的「率型祖先之德」能清楚看出，器主將自身放置於宗族的網絡之中，強調與「祖先之德」的連繫，而此種敘述角度亦不見於非器主曰開篇銘文，除〈番生簋蓋〉(4326)「番生不敢弗帥型皇祖考丕丕元德」外，³⁵ 其餘皆是史官代言周天子帥型先祖或是勉勵下屬帥型先祖之它述口吻。若將「帥型先祖之德」視為器主自我勉勵之辭而進一步分析，便可以發現即使「現在」是由器主本人繼承家族職位並且獲得政府認可，其仍將自身與家族歷史連繫起來。同時通過「用作先祖寶尊彝」更能反映銘文與器物之關係，甚至是整個禮儀過程中所隱含的宗法制度，羅泰曾提到獻辭的公私領域轉換現象：

這種禮儀的轉化把已有的職位、功績及其伴隨的賞賜，從一種中性的、與王及其官方相關的公領域，變成獨佔的、個人化的、

及〈虢季子白盤〉(10173)「丕顯子白」。其中〈番生簋〉敘述口吻最接近「器主曰」開篇銘文，值得進一步探討，其於二者則為偶見情形與不同情境，可視為例外。上述銘文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三卷》，頁406、461、130。

³⁴ 銘文引自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網站，網址：<http://bronze.asdc.sinica.edu.tw/rubbing.php?NA1874> (檢索日期：2017年3月15日)。

³⁵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三卷》，頁461。

與作器者及其家族密切關聯的私領域。從而通過銘文的明確陳述、祖先祭祀的行為和禮器，建立與家族神靈的關係。³⁶

此種現象不僅多見於西周中、晚期長篇銘文，亦很適宜用以觀察「器主曰」開篇銘文的獻辭。上述十篇銘文中不少提及器主與周天子之關係，如「王用弗忘聖人之後，多蔑曆易休」、「迺天子多易（賜）旅休，旅對天子魯休揚」、「天子寵蔑梁其曆」，〈逯盤〉、〈大克鼎〉甚至於銘文後半直接紀錄器主受冊命之過程，顯示此儀式背景當是宣告器主承接公領域的政府官方職位。從器主宣稱之「率型祖先之德」到「用作祖先寶尊彝」，則可看出整段文字乃是面向私領域的家族祖先神靈，可見器主認為其之所以繼承這份榮耀與職位，主要來自家族血緣的延續，而非自身實力或是天子賞識。而且經由對器主身分的考察得知，西周貴族在鑄器作銘時並非可隨意稱頌祖考之德，似乎只有在其家族政治勢力足夠強大的條件下（即世代執掌王朝要職），才能做到這一點。³⁷ 雖然西周貴族社會基本處於權位來自於祖先遺留的意識形態當中，但通過「器主曰」開篇銘文獻辭之陳述，可以更清楚看見器主私領域的家族位置與公領域的王官身分是如何被連繫起來。器主顯然認為唯有通過家族祖先神靈的指引庇佑，才能善盡職責並成為周天子認可的卿士，以順利將屬於家族的職位代代相傳下去。

³⁶ 〔美〕羅泰，〈西周青銅銘文的性質〉，《考古學研究（六）》，頁 347。

³⁷ 劉源認為所謂的「祖考哲厥德」、「秉明德」等等語句並非完全是溢美之辭，而是相對客觀、理性地評價祖考的功績，其目的既在於炫耀家族的政治勢力，也在於作器者自我勉勵。凡宣稱「帥型祖考之德」的貴族，其本人一般也受到周王（或主公）的寵幸和重用，或有突出的功勳，他們鑄器作銘時強調遵循、效法祖考的政治表現與作為，一方面是肯定自身的政治地位、權力和業績，另一方面也是寄望未來，祈求能得到周王更多的重用，並祝願通過個人的進取實現家族勢力的長盛不衰。詳見劉源，〈試論西周金文「帥型祖考之德」的政治內涵〉，《周秦倫理文化與現代道德價值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不詳；劉源，〈試論西周金文「帥型祖考之德」的政治內涵〉，先秦史研究室網站，網址：<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294.html>（檢索日期：2016 年 10 月 31 日）。

第三部分是屬於「未來」的嘏辭部分，仔細分析銘文可以發現從〈癸簋〉到〈逯盤〉都有「用追孝先人」之句，用以說明製作此器的目的乃是獻給先祖。其後則見「降器主／余多福」之句，以祈求獲得祖先之庇佑，說明器主期望對祖先的祭祀與稱頌能轉化為福祉並回歸於自身，而最後一句「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則是將過去的榮耀與後來世代建立起一個直接的連繫，器主顯然希望通過自身將家族德業與職位得以永世傳承。儘管這段嘏辭充滿銘文習見的套語，但仍顯示周代家族政治的意識形態基礎，乃是對宗族世系的永恆關注。後世子孫往往視祖先為最高典範並加以仿效，同時期盼自身也能成為子孫仿效的新典範。

通過格式分析，可以感受到「器主曰」開篇銘文與西周中、晚期長篇銘文的差異在於較顯著的主述口吻，不僅更能展現器主面對先祖的心境與立場，更提供一種不同角度的敘述，以展現銘文習見的西周世族、政治以及宗教意識。「器主曰」開篇銘文的製作目的與動機，或許與非器主曰開篇銘文差異不大，然而此種高度穩定的敘述結構，仍說明其產生乃是指向一個特殊的背景或儀式，因此必須進一步探問的是，此類銘文的文本性質究竟為何？與西周早期的禱辭性質又具備什麼樣的繼承關係？

（二）「器主曰」開篇銘文的文本性質

過往學者對於「器主曰」開篇銘文的文本性質雖有所討論，但何樹環與陳英傑的看法並不相同，陳氏更點明這類銘文在兩周的情況有所差異，無法一概而論。若僅就西周興盛期的銘文而言，似乎仍可能從高度穩定性的結構中，進而推想其文本性質與製作動機。那麼需要進一步探問的是，此文本究竟是反映什麼樣的儀式過程？是否可以和「頌」類比，或僅是初次繼承父職或接受天子重新任命所做的祭告之

辭？

本文同意陳英傑所言，但凡西周中、晚期長篇銘文即使不是以「器主曰」開篇，也很有可能來自宗廟的頌辭，³⁸ 因此「頌」詩與「器主曰」開篇銘文較大差異乃在於敘述立場與口吻之不同。雖然「頌」詩在稱述先王功烈的部分與銘文伐閔之辭頗為相似，然「頌」主要是從後代子孫的立場，面向周代祖先或是試圖建構關於周代開國與治國的記憶，以他述口吻勾勒出宏大的歷史視野。相較之下，西周中、晚期的「器主曰」開篇銘文卻是器主向宗廟宣告自己繼承家族官爵時製作的祭告文書，雖然也同樣是面向祖先，然其敘述立場乃是器主自身藉由對先祖的稱頌，強調自身納入家族傳承的榮耀體系，並以主述口吻建構器主家族為周王廷奉獻之記憶，其中亦包含對自身的期許與勉勵。

至於「器主曰」開篇銘文是否為初次繼承父職或接受天子重新任命所作？從銘文內容來看，似乎未有直接證據可以確定銘文製作的具體背景或時間點，僅能從〈逯盤〉、〈大克鼎〉的冊命內容約略推估是器主接受周天子重新冊命以後所作，³⁹ 但其餘篇章是否為初次接受父職所作則不得而知。若欲釐清此類銘文的文本性質，似乎不宜忽視西周早、中期的〈沈子它簋〉或〈或方鼎〉，雖然西周中、晚期的銘文與之不盡相同，但從祈求祖先的庇佑降福以及將己身的榮耀歸功給先祖的態度，都說明了此類銘文仍延續禱辭的根本性質。換言之，無論

³⁸ 陳英傑表示「其實，其他很多不是以「某曰」開篇的銘文，又何嘗不是宗廟中的頌辭。」陳英傑，《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頁 819。

³⁹ 何樹環曾就〈逯盤〉銘文進行細部分析，指出「細譯 7 銘（按：逯盤銘）所述，其於逯之先祖雖無明記職官為何，但其先祖乃輔佐歷代周王之臣工，確無可疑。而『逯肇纂朕皇祖考服』，由〈班簋〉中『王命毛伯更號或公服』，亦可明確得知逯已承繼了其先祖之職事，則逯在此之前『纂朕皇祖考服』時，當已接受過一次錫命。」由此可知，〈逯盤〉銘文並非陳英傑所謂是初次世襲父職所作。何樹環，《西周錫命銘文新研》（臺北：文津出版社，2007 年），頁 258。

文本的寫作動機是將過世先祖祔入宗廟、開戰出征或是世襲官爵，器主都是做為家族一份子向祖先祈求福佑，因此即便西周興盛期的「器主曰」開篇銘文格式已有明顯不同，但依舊可視為祭祀儀式中的禱告文書。

既然西周中、晚期的「器主曰」開篇銘文本質承自禱辭，則需說明為何有著如此不同樣貌？此時期的銘文顯然不若〈沈子它簋〉詰屈聱牙、不易理解，也不如〈或方鼎〉口語風格強烈，而是形成一套更加制式化的敘述結構。若進一步仔細觀察，便不難發現「器主曰」開篇銘文其實經常使用某些固定套語，例如「用辟先王」、「曩純亡敗」、「克明毕心」、「率型祖考之德」，顯然無論實際祭祀儀式中的禱念如何被呈現，當其轉化為銘文時便一律使用這套穩定性高且用語固定的表達模式。表面上，這套言語模式相當接近同時期的非器主曰開篇銘文，但不同於非器主曰開篇銘文的禱辭、頌辭多是由祝官語氣代替器主敘述，器主曰開篇銘文無論如何都保留了器主立場的主述口吻，因此儘管兩者都有層疊套用的現象，但在禱辭、頌辭的敘述套語使用上仍存在他述與自述兩種不同立場的表達方式。

正因「器主曰」開篇銘文保留明確的主述口吻，是以從發展脈絡而言，本文認為仍與西周前期的禱辭形式有關，「器主曰」後續的文字仍屬禱辭文本，只是已非祭祀者真正的言辭，更非原始祭祀文本的組成部分，而是被有意重新編寫的文本框架。⁴⁰ 羅泰亦曾觀察到癸器 and 述器都存在銘文展開和壓縮兩種版本，而壓縮版本中的伐閱之辭又有被大幅省略的情形，由此推知銅器銘文可能不是文件原本，而是從

⁴⁰ 此觀念為柯馬丁在談論秦始皇（259-210 B.C.）石刻時所提及，其認為秦公簋的「秦公曰」「公及王姬曰」並不是秦公言語的組成部分，而是代表了言辭所嵌入的情境與文本框架。這些介紹程式無論是直接產生於祭祀活動，或是出自禮儀官員之口，或是後來才添加於銘文之中，其目的都是在表明器主乃贊詞、禱辭的主語，同時強化了銘文戲劇性的表演維度。詳見〔美〕柯馬丁著，劉倩譯，《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頁 92。

藏於作器者家族檔案衍生出來之文本，而原始文件中多少訊息進入銘文，往往取決於器物的空間。⁴¹ 羅泰此觀點值得深思，若從高度穩定的銘文結構來看，不難推知這些「器主曰」開篇銘文也應存在一個更為複雜且口語化的原始文本，而目前所見的銘文僅是在原始文本基礎上，經過重新編選而成的濃縮版本，故其內容包括禱辭、頌辭或是製作動機的敘述。

四、兩周之際到春秋中期：題材的匯流與轉向

兩周之際的「器主曰」開篇銘文迎來一股新變，本文將以下六篇銘文分為兩類進行討論。

（一）軍事銘文的匯流

此時部分記錄軍事戰功的銘文也開始選擇以「器主曰」開篇的方式呈現，茲將銘文羅列如下：

禹曰：丕顯桓桓皇祖穆公克夾紹先王奠四方。肆武公亦弗段忘朕聖祖考幽大叔、懿叔，命禹屨（纂）朕祖考，政于井邦。肆禹亦弗敢愆惕，共朕辟之命。烏虜（乎）哀哉，用天降大喪于下國，亦唯鄂侯馭方率南淮尸（夷）、東尸（夷），廣伐南國、東國，至于歷內。王迺命西六師、殷八師，曰：「翦伐鄂侯馭方，勿遺壽幼。」肆師彌怵匄恆，弗克伐鄂。肆武公迺遣禹率公戎車百乘，斯（廡）馭二百，徒千，曰：「于將朕肅慕，東西六師、殷八師，伐鄂侯馭方，勿遺壽幼。」季禹以武公徒馭，至于鄂，敦伐鄂，休獲畢君馭方。肆禹又（有）成，敢對

⁴¹ [美] 羅泰，〈西周青銅銘文的性質〉，頁 351-352。

揚武公丕顯耿光，用作大寶鼎，禹其萬年子子孫孫寶用。(禹鼎，2833)⁴²

佳十又一月乙亥，戎生曰：休辭皇祖憲公，**趯趯趯趯**，啟畢明心，廣罔其猶，**越**再穆天子**靈**，用建于茲外土滿，司蠻戎，用軌不廷方。至于辭皇考邵伯，**越越**穆穆，**懿**不替，召匹晉侯，用葬王命。今余弗段灋(廢)其覲光，對揚其大福，劓遣鹵積，俾譖征繁湯，取卣吉金，用作寶協鐘，卣音雍雍，鎗鎗鋪鋪，琅琅鶉鶉(肅肅)，既穌且淑，余用紹〔各〕、追孝于皇祖皇考，用祈綽〔綰〕、眉壽，戎生其萬年無疆，黃者有**靈**，峻保其子孫，永寶用。(戎生編鐘，新收 1613-1620)⁴³

佳王九月乙亥，晉姜曰：余佳司朕先姑君晉邦，余不段妄寧，罔離明德，宣卿我猷，用紹匹辭辟。每揚卣光刺，度不象，魯覃京師，乂我萬民，嘉遣我，易鹵積千兩，勿廢文侯覲令，俾貫通__，征繁湯(陽)、離，取卣吉金，用作寶尊鼎，用康柔妥裒遠邇君(子)。晉姜用祈綽綰眉壽，作靈為巫，萬年無疆(疆)，用享用德，峻保其孫子，三壽是利。(晉姜鼎，2826)⁴⁴

上引三篇銘文的格式雖不盡相同，但內容有一定程度的連繫，故可合觀。首先從西周晚期的〈禹鼎〉銘文格式來看，可發現其與〈戎方鼎〉相似之處，兩者都涉及軍事戰役並提到先祖，因此陳英傑很直接地判斷〈禹鼎〉和〈戎方鼎〉屬於同類銘文。⁴⁵ 然而若是仔細分析卻可以發現兩者的寫作情境並不相同，〈禹鼎〉銘文主要記述西周王

⁴² 本篇銘文隸定、斷句參考黃天樹，〈禹鼎銘文補釋〉，收入張光裕、黃德寬主編，《古文字學論稿》(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60-61。

⁴³ 戎生編鐘銘文隸定與斷句參考裘錫圭，〈戎生編鐘銘文考釋〉，頁106。

⁴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二卷》，頁392。

⁴⁵ 陳英傑，〈兩周金文「器主曰」開篇銘辭研究〉，頁821。

朝與鄂侯的一次戰爭，全文可以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從「禹曰」到「共朕辟之命」乃是延續稱頌祖先德業的傳統，並說明禹承繼家族職位以奉家主之命。第二部分從「烏虜哀哉」到「休獲畢君馭方」則記述此次戰爭的前因後果，從鄂侯進犯周朝，到禹奉家主武公之命前往伐鄂，最後擒獲鄂侯。第三部分始自「肆禹有成」至「禹其萬年子子孫孫寶用」，主要說明鑄器緣由並期盼此器能得子孫寶用。由此看來，〈禹鼎〉顯然是為了追憶這次成功征討鄂侯的戰役所作，並非戰前的祈禱。雖然全篇銘文仍保持顯著的主述口吻，但作器目的已非祈求祖先降福庇佑，而是為了彰顯軍功。此外即使同樣記述戰事勝利，〈禹鼎〉亦不似〈戎簋〉將榮耀歸功於祖先，而是提到「肆禹有成」及「敢對揚武公丕顯耿光」，顯示對禹而言，此次戰役勝利的關鍵在於己身與家主武公。從〈禹鼎〉對戰爭內容的敘述來看無疑為敘述性軍事銘文，但其選擇以「禹曰」開篇，並融入頌揚祖先文字及主述口吻，卻是過往所未見的，故此篇銘文可視為軍事題材與「器主曰」開篇銘文風格的匯流關鍵。

類似情形雖也見於兩周之際的〈戎生編鐘〉，但不見〈禹鼎〉「翦伐鄂侯馭方，勿遺壽幼」等誓師之辭⁴⁶或「季禹以武公徒馭，至于鄂，敦伐鄂，休獲畢君馭方」描述戰爭過程的文字，故其格式與敘述風格似乎更接近「器主曰」開篇銘文。〈戎生編鐘〉開頭使用「記時+器主曰」新型格式，第一部分不僅出現了稱頌皇祖憲公、皇考邵伯功績德業的文字，第二部分從「今余弗段灋（廢）其覲光」到「用作寶協鐘」也是相當典型的獻辭型態，僅在敘述作器原因時提及一場征伐繁陽、獲取吉金的戰役。至於春秋早期的〈晉姜鼎〉有更進一步發展，其銘文前段已省略了稱頌祖先德業的部分，除了一句「余佳司朕先姑君晉邦」說明自身繼承「先姑」的職責，絕大部分內容是晉姜敘述自

⁴⁶ 劉雨，〈銘文中的軍事〉，《金文論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頁96。

己如何不敢懈怠地輔佐丈夫安定京師、治理百姓，同時也提到征伐繁陽、獲取吉金一事。雖然從「余不段妄寧」、「宣~~亦~~我猷」、「又我萬民」、「嘉遣我」等句仍能看出顯著的主述口吻，銘文也不若〈禹鼎〉或〈戎生編鐘〉如此明顯地紀念特定戰役的勝利，但就內容來看，主旨似乎較為強調自身在職務上的努力不懈與相關功績。

綜上所論，此三篇銘文雖具備「器主曰」開篇格式與主述口吻，不過其性質與發展方面卻出現些許不同。從性質論之，西周晚期的〈禹鼎〉與〈戎生編鐘〉多半被視為典型的軍事銘文，尤其是〈禹鼎〉銘文後半部對戰事敘述與描寫，基本維持傳統的軍事銘文風格，與「器主曰」開篇銘文述祖主題可謂相當不同，也未見器主禹將功績歸於祖先遺留或庇蔭之企圖。再從「器主曰」開篇銘文的歷時性發展來看，這三篇銘文應可當視為「器主曰」開篇格式與不同題材的交會例證，敘述戰事類的軍事銘文不僅在兩周之際到春秋中期開始出現「器主曰」開篇的主述模式，並在主述口吻與戰事描繪間尋求平衡，形成一種兼容並蓄的風格。此現象不僅昭示「器主曰」開篇格式開始對不同題材銘文產生滲透，更象徵軍事銘文的敘述模式出現新轉變，而此種交會將對春秋時期「器主曰」開篇銘文形成重要影響。

（二）稱頌主題的轉換

王曰：有余佳（雖）小子，余亡康晝夜，丕雖先王，用配皇天，簧肅朕心，墜于四方，肆余以饗士獻民，再盥先王宗室，馱作鬯彝寶簋，用康惠朕皇文刺祖考，其格前文人，其瀕在上帝廷陟降，~~鬯~~鬯皇〔帝〕大魯令，用齡寶我家、朕立（位）、馱身，陀陀降余多福、憲壹宇慕遠猷，馱其萬年，鬯實朕多御，用奉壽，句永令，峻在立（位），作憲在下。佳王十又二祀。（馱簋，

4317) ⁴⁷

秦公曰：我先祖受天命，賞宅受國，烈烈邵文公、靜公、憲公，不象（弛）于上，邵合皇天，以虢事蠻方。公及王姬曰：余小子，余夙夕虔敬朕祀，以受多福，克明又心，鑿蘇胤士，咸畜左右，趯趯允義，翼受明德，以康奠協朕國，羨百蠻，具即其服，作卣蘇鐘，靈音錚錚離離，以匡皇公，以受大福，屯（純）魯多釐，大壽萬年，秦公其峻令在位，膺受大命，眉壽無疆，匍有四方，其康寶。（秦公鐘，262）⁴⁸

秦公曰：丕顯朕皇祖受天命，鼎宅禹責（蹟），十又二公，在帝之坏，嚴恭夤天命，保業卣秦，虢事蠻夏，余雖小子，穆穆帥秉明德，刺刺趯趯，萬民是敷。咸畜胤士，趯趯文武，鎮靜不廷，虔敬朕祀，作尋宗彝，以邵皇祖，其嚴徵各，以受屯（純）魯多釐，眉壽無疆，峻彙才天〔位〕，高引又慶，窶囿四方，宜。（秦公簋，4315）⁴⁹

此三篇銘文特點在於器主身分極高，故展現出與其他銘文頗為不同的敘述立場。西周晚期的〈猷簋〉乃周厲王所作之器，「王曰」之後的銘文可依結構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從開頭到「稱盥先王宗室」，周厲王稱述自己如何勤奮努力，以繼承王位治理國家四方及宗室。第二部分除了說明作器緣由外，更多篇幅是在祈求先祖庇佑周王室、王位以及厲王本身，期許神靈能降下福壽，使之長保在位。從銘文內容看來，很明顯是一篇在宗廟祭儀使用的祭告文本，其背景並不涉及王位的繼承或是任何特定事件，過往常見稱頌祖先德業的部分也被完全省略，重點放在周厲王向先王報告自身如何勤勉於政以及祈求福佑的

⁴⁷ 銘文相關考釋可參見張政娘，〈周厲王胡簋釋文〉，《張政娘文集·甲骨文與商周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245-260。

⁴⁸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一卷》，頁230。

⁴⁹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三卷》，頁444。

部分，其主題顯然與西周其他的「器主曰」開篇銘文有很大不同。至於另外兩篇春秋早期〈秦公鐘〉、〈秦公簋〉銘文雖與西周興盛的三段式結構大抵相同，但稱頌的先祖包括「文公、靜公、憲公」甚至是「十又二公」，其涵蓋範圍甚廣，也不似西周針對特定的受器者一一追述。秦公首先將自身擺放於接受宗族延續的君主職務位置，其次說明將「穆穆帥秉明德」依循先祖德業治理國家，最後則是祈求祖先的庇佑。整體而言，三篇銘文關於描述器主己身的篇幅比過往增加不少，雖仍有稱頌先祖的部分，然其重點更偏向器主對自身的期許。〈獸簋〉固然因器主地位極高而使得銘文結構、主題有所不同，但另外兩篇春秋早期的〈秦公鐘〉、〈秦公簋〉銘文即便比較完整地保留了西周格式，主題也不免偏向強調器主的政治功績。

綜觀兩周之際的「器主曰」開篇銘文，大致呈現兩種發展情勢：一類如〈禹鼎〉以不同主題與「器主曰」的開篇格式、敘述風格匯流，形成並發展出〈晉姜鼎〉這類突顯自身功績的銘文型態。另一類則是延續西周興盛期的三段式結構的銘文，但因器主身分地位極高而衍伸出的不同敘述立場，主要集中於秦國青銅器。可見從兩周之際到春秋中期間「器主曰」開篇銘文的結構、性質乃至於主題方面似乎開始出現不同程度的匯流與演化，而其可視為春秋戰國時代銘文轉變的發端。

五、春秋中、晚期：揚己背景的影響

春秋時代「器主曰」開篇銘文約有八篇，包含〈晉公盃〉(10342)、〈蔡侯申鐘〉(210-211)、〈配兒鈎鐘〉(427)、〈僕兒鐘〉(183)、〈郟鸞鐘〉(225-237)、〈三兒簋〉(4245)、〈虢巢鐘〉(新收 1277-1282)、〈之乘辰鐘〉(新收 1209)等，皆展現出與前期頗為不同的格式與性質，為方便分析，茲引述典型者如下：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晉公曰：我皇祖唐公，雁（膺）受大令，左右武王，敬□百蠻，廣司四方，至于大廷，莫不事公。〔王〕命唐公，戎〈成（定）〉宅京師，□□晉邦，我刺（烈）考□公□□□□疆（疆），武（？）□□□□□□，號號（赫赫）在上，□□□□□□台黻（業）□□□□□□晉邦。公曰：余雖（唯）今小子，敢帥井（型）先王，秉德勳勳（秩秩），珣（柔）變萬邦，諛諛（哀哀）莫不日賴（卑）覺（恭），余咸畜胤士，乍（作）馮左右，保翳（乂）王國，荆粟（？暴？）霏（舒）復（迨），丕嚴號若否。作元女孟姬□□媵蓋四蓋，□□□□，虔葬（恭）盟祀，以會（答）揚皇卿，柔新（親）百黼（？）。雖今小子，整翳（乂）爾家，宗婦楚邦，烏（於）卽萬年，晉邦唯翰（翰），永康寶。（晉公蓋，10342）⁵⁰

隹正五月初吉孟庚，蔡侯申曰：余唯末少子，余非敢寧（寧）忘（荒），有虔不易（惕），輶（佐）右（佑）楚王，霍霍豫政，天命是遷，定均庶邦，休有成慶，既息（聰）于心，征中厥德，均好大夫，建我邦國，豫令祗祗，不愆不賁（忒），自作歌鐘，元鳴無期，子孫鼓之。（蔡侯申鐘，210-211）⁵¹

□□□初吉庚午，吳王□□□□□子配兒曰：余孰戕（臧）于戎攻（功）且武，余邲（畢）葬威（畏）嬰（忌），余不敢誇，余擇畢吉金，鉉（玄）鏐鏐鋁，自作鈞鐸，以宴賓客，以樂我者（諸）父，子孫用之，先人是諱。（配兒鈞鐸，427）⁵²

隹正九月初吉丁亥，曾孫僕兒：余迭斯于之孫，余茲徭之元子。

⁵⁰ 本篇銘文釋文有多種不同看法，本文採取謝明文所作釋文。詳見謝明文，〈晉公蓋銘文補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237-238；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六卷》，頁194。

⁵¹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一卷》，頁173-175。

⁵²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一卷》，頁464。

曰：於虘敬哉，余義楚之良臣，逯之字（慈）父，余購逯兒得吉金罇，台（以）鑄甗鐘，台（以）追孝先祖，樂我父兄，飲飩（食）歌舞，孫孫用之，後民是語（娛）。（僕兒鐘，183）⁵³

隹王正月初吉丁亥，邵蠶曰：余畢公之孫，邵伯之子，余頡岡事君，余畧孔武，作為余鐘，玄鏐鑄，大鐘八肆，其竈四堵，喬喬其龍，既壽鬯虞，大鐘既縣（懸），玉鑿鼉鼓，余不敢為喬（驕），我以享孝，樂我先祖，以祈眉壽，世世子孫，永以為寶。（邵蠶鐘，225-237）⁵⁴

上引五篇銘文時代包含春秋中期到晚期，除〈晉公盞〉約屬春秋中晚期之外，其餘多為春秋晚期器，雖未羅列全部銘文，但仍可清楚發現銘文結構的動態變化。第一篇〈晉公盞〉銘文雖然有不少殘泐之處，但仍保留西周傳統的三段式結構，第一段「記時+晉公曰」從晉國始封之祖唐公功業開始追述；第二段「公曰」則是述說自己帥型先祖，並且「咸畜胤士」、「保乂王國」，在表明己身敬秉祖先德業之外，亦不忘宣揚志向；第三段則是晉公告誡與祝福其女的言辭。從銘文內容而論，此器乃是嫁女之媵器，故其製作目的與過往於宗廟祭告文本有一定程度的差異，昭示春秋時代「器主曰」開篇銘文似乎發生新的轉向與變化。至於其他銘文的篇章結構更出現顯著不同，大約有以下三點特徵：

（一）省略述祖的伐閱之辭

在上引銘文中，除了〈晉公盞〉還保有西周時期的述祖結構與禱

⁵³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一卷》，頁143。

⁵⁴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一卷》，頁202-210。

辭性質外，其餘都出現較明顯的變化，而西周時期頗具特色的述祖之辭更是完全消失。從銘文結構來看，春秋時期多數「器主曰」開篇銘文包含兩部分：一部分是器主對己身之宣揚，例如〈蔡侯申鐘〉「余非敢寧（寧）忘（荒），有虔不易（惕），輶（佐）右（佑）楚王，霍霍豫政，天命是遷，定均庶邦，休有成慶，既愍（聰）于心，征中厥德，均好大夫，建我邦國，豫令祗祗，不愆不賁（忒）」、〈配兒句鐘〉「余孰戕（臧）于戎攻（功）且武，余邛（畢）奠威（畏）嬰（忌），余不敢諱」、〈僕兒鐘〉「余義楚之良臣」、〈郟鸞鐘〉「余頡岡事君，余豐朏武」等等，內容多是強調器主勤奮勉勵、恭敬謹慎的侍奉上司，其敘述主題較傾向頌揚己身的工作、行事態度。另一部分則是春秋銘文習見的內容，亦即說明鑄器緣由以及目的。

雖然不少銘文表明其目的為「追孝先祖」，但從整體春秋銘文角度來看，則很容易發現省略述祖之辭後的「器主曰」開篇銘文，無論在結構或是內容主題與非「器主曰」開篇銘文並無不同，例如〈邾公慆鐘〉（149）：

隹（唯）王正月初吉，辰才（在）乙亥，龜（邾）公慆彝（擇）
畢（厥）吉金，玄鏐膚（鏞）呂（鋁），自乍（作）彝鍾（鐘），
曰：余畢奠威（畏）忌，鑄辟彝鍾（鐘）二錯（堵），台（以）
〈樂〉其身，台（以）匡（宴）大夫，台（以）喜者（諸）士，
至于璜（萬）年，分器是寺（持）。⁵⁵

其結構基本也是由頌揚己身與鑄器目的兩部分所組成，銘文雖未以「邾公慆曰」開篇，然從「余畢奠威（畏）忌」可知其敘述立場亦為器主自述。可見此時「器主曰」開篇銘文雖保存「記時+某曰」的外在形式，但隨著述祖之辭省略，文本原來所呈現之「宗教性」似乎隨

⁵⁵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一卷》，頁114。

之消失，其性質顯然已非紀錄特定場合或儀式的祭告文本，而銘文核心已被春秋時代的流行結構「器主擇其吉金，用作某器」所取代，只是表現形式較為繁複。

（二）出現自報家門的格式

春秋時期多數「器主曰」開篇銘文都省略第一段的述祖之辭，除〈蔡侯申鐘〉以外的篇章，經常出現強調器主為「某人之孫，某人之子」之自報家門格式。此種自報家門格式始見於春秋中期，流行於春秋晚期，不限於「器主曰」開篇銘文，但在蔡、吳、徐等南方青銅器特別常見，不僅具有顯著的時代性，且包含一定程度的地域特徵。

過往學者曾試圖對此現象提出解釋，陳英傑認為此種格式與西周祖述先人有關，過去的述祖之辭重在表白器主家族對上司的功勞和貢獻，確立家族世襲地位的合法性與重要性，反映西周宗法和封建制度緊密結合的政治特色。但是春秋時期器主冠以先世名號的現象，乃是表明這些器主雖多有社會地位，甚至貴為諸侯大夫，卻因仍屬姬、姜等華夏大姓之外，從而感到有申述世系之必要，其目的也是在於顯其族氏的顯赫。⁵⁶ 相對於陳英傑從族氏立場解釋這類格式的出現，日本學者江村治樹則是考慮到春秋時代的背景，認為與器主尋求自身定位較有關，此種特地紀錄父祖之名和出身地的習慣，是由於春秋中晚期乃是不安定的變動時代，因而有必要對自身所處的空間、時間位置進行確認。⁵⁷ 兩者說法雖角度不同，但各有其脈絡及合理性，因此應當結合內部發展與外緣因素來看，當可更為完整合理的認識此一動態變化。

⁵⁶ 陳英傑，〈兩周金文「器主曰」開篇銘辭研究〉，頁 833-834。

⁵⁷ 〔日〕江村治樹，〈春秋時代青銅器銘文の書式と用語の地域別変遷〉，《春秋戦国秦漢時代出土文字資料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2 年），頁 101。

本文認為春秋銘文自報家門的格式，有其獨特時空背景，雖與「器主曰」開篇銘文的述祖形式接近，卻不是實質意義的相同。儘管自報家門格式仍能展現作器者的身分來歷，但那些被提及的父祖之名似乎也只是為了鋪陳器主身分地位，使其自身也能被歷史化、典範化，說明器主對自身功業與家族的關聯開始產生不同想法。此種變化具有較顯著的目的性，顯示春秋時人似乎更加在意現世讀者如何認識作器之人，尤其對於非屬華夏中原的南方諸侯而言，為了在動盪時代中彰顯自身實力，恐怕更有必要強調器主的地位與功績，使之成為後代子孫所接受的記憶。此種由宗族到個人的轉變，雖在春秋時代南方地區逐漸顯露，但若從歷時性的角度來看也並非完全沒有端倪。

（三）與非器主曰開篇銘文的合流

隨著春秋時代「追孝」觀念及表現方式出現不少轉變，「器主曰」開篇銘文的內容亦出現明顯不同，不僅過往強調先祖德業之辭，已被完全省略或僅止於簡單提點，器主個人行事準則或功業榮耀也成為銘文強調主題，顯示春秋時人不再如以往追求將個體職務、地位與宗族祖先結合。值得注意的是，此現象並非僅限於「器主曰」開篇銘文，而是所有的春秋銘文，因此從內容與敘述方式來看，「器主曰」銘文出現一股與非器主曰銘文的合流趨勢，形成一套相當相似的敘述立場與語言。例如自報家門格式也見於非器主曰開篇的〈鄭臧公之孫鼎〉（新收 1237）「余奠（鄭）臧公之孫，余刺之痃子」、⁵⁸〈甚六鐘〉（新收 1251）「奮（舒）王之孫、尋楚馱之子邁邠」等等。⁵⁹ 至於器主

⁵⁸ 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網站，網址：<http://bronze.asdc.sinica.edu.tw/rubbing.php?NA1237>（檢索日期：2017年3月15日）。

⁵⁹ 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網站，網址：<http://bronze.asdc.sinica.edu.tw/rubbing.php?NA1251>（檢索日期：2017年3月15日）。

宣揚己身之部分更是如此，以下略舉〈王孫誥鐘〉銘文進行比對：

隹（唯）正月初吉丁亥，王孫誥（誥）彝（擇）其吉金，自乍（作）彝鐘，中斡（翰）戲（且）揚（揚），元鳴孔諶。又（有）嚴穆穆，敬事楚王。余不斁（畏）不差，惠于政邇（德），怒（淑）于威義（儀），鬲（恭）馱遲，斁（畏）嬰（忌）趨趨，肅折（哲）臧戩（禦），聞于四國，鬲（恭）卬（厥）盟祀，永受其福，武于戎攻（功），誨懃（猷）不飢。闌闌彝鐘，用匱以喜，以樂楚王、者（諸）侯、嘉賓及我父兄、者（諸）士，趨趨趨趨，邁（萬）年無異（期），永保鼓之。（王孫誥鐘，新收 418）⁶⁰

這篇銘文大抵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從「隹（唯）正月初吉丁亥」到「中翰且揚」是說明王孫誥的作器事實；第二部分「有嚴穆穆」到「誨懃（猷）不飢」是王孫誥的揚己之辭；第三部分則是說明作器目的。不難發現，除未有「器主曰」開篇及自報家門格式外，〈王孫誥鐘〉銘文內容與上引「器主曰」開篇銘文僅是順序略有差異，甚至連主述口吻「余不斁（畏）不差」與宣揚言辭「敬事楚王」、「武于戎攻（功）」、「怒（淑）于威義（儀），鬲（恭）馱遲，斁（畏）嬰（忌）趨趨」都有不少相近之處。

若由「器主曰」開篇銘文共時性角度言之，則可謂「器主曰」開篇銘文開始與其他銘文產生交互影響，其原有的主述口吻以及展現器主心境之敘述手法，於此時已為非器主曰開篇銘文所吸收，兩者除開篇形式上的差異外，敘述立場與主題內容已無法分辨。但若從歷時性而論，亦可說「器主曰」開篇銘文發展至春秋時期確實存在主題與立場的轉向，如果西周時期的「述祖」是嘗試記憶一個宗族的榮耀源頭

⁶⁰ 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網站，網址：<http://bronze.asdc.sinica.edu.tw/rubbing.php?NA0418>（檢索日期：2017年3月15日）。

與賦予，那麼春秋時代的「揚己」則是在截斷過去習見的記憶方式，藉由將個人功績之完成推向銘文讀者，並提供另外一種記憶的方式，即個人的歷史將不是再被鑲嵌進一個源遠流長的家族脈絡，而是另外一種新造歷史的開端。

六、戰國時代：從繼承到衰退

戰國時期典型的「器主曰」開篇銘文僅有三篇，⁶¹ 其結構與西周春秋並無太大不同，然部分內容涵意有較明顯的轉變，故錄其全文如下：

隹（唯）王五月元日丁亥，助曰：余陳仲翦孫，釐叔和子，葬寔（賁）鬼神，畢葬（恭）懼（畏）忌，選擇吉金，作茲寶簠，用追孝於我皇餽鎬。（陳助簠蓋，4190）⁶²

隹（唯）王正月初吉丁亥，少子陳逆曰：余陳起子之嫡孫，余寅事齊侯，懽血（恤）宗家，擇卒吉金，台（以）作卒元配季姜之祥器，鑄茲寶簠，台（以）宮台（以）孝于大宗、皇祖、皇妣、皇考、皇母，作遂今命，眉壽萬年，子子孫孫羨（永）保用。（陳逆簠，4029）⁶³

隹（唯）正六月癸未，陳侯因賁曰：皇考孝武起公，葬（恭）戲，大慕克成，其唯因賁揚皇考，叟（紹）練（踵）高祖黃帝，侁（纂）翌（嗣）起文，⁶⁴ 朝問諸侯，合（答）揚卒德，

⁶¹ 春秋戰國之際的〈哀成叔鼎〉也是「記時+嘉曰」開篇，然而此「嘉」是否為器主，學者還有不同意見，同時其內容較為特殊，乃指涉特定事件與人物，應與西周春秋以來的述祖揚己脈絡無關，故本文不予討論。

⁶²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三卷》，頁325。

⁶³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三卷》，頁464。

⁶⁴ 關於「紹踵」一詞過去有兩種看法：其一為徐中舒認為「祖」為名詞，乃祖先之義，故屬

者（諸）侯寧（夤）薦吉金，用乍（作）孝武桓公祭器敦，
台（以）彝（蒸）台（以）嘗，保有齊邦，豈（世）萬子孫、
永為典尚（常）。（陳侯因齊敦，4649）⁶⁵

上舉三篇銘文中的前兩篇仍是承襲春秋銘文結構，包含器主的自報家門、頌揚己身恭謹祭祀以及說明鑄器目的等部分都與過去相同。從銘文內容來看，製作這兩件青銅器的目的雖是用於祭祀先祖，但在「器主曰」之後不僅未見述祖之辭，〈陳逆簠〉更是直接表明此器乃陳逆作予元配季姜之器，希望季姜用於祭祀，而非由陳逆直接獻給過世祖先。

至於戰國中期的〈陳侯因齊敦〉銘文則較為特別，值得進一步深究。陳侯因齊即是文獻所言的齊威王因齊（約 378-320 B.C.），而齊威王又是齊國最早稱王者，故通讀此器銘文時，不能輕易忽略器主特殊的政治地位與野心。從銘文結構來看，〈陳侯因齊敦〉也是呈現三段式結構：第一部分是齊威王稱頌皇考孝武桓公（約 440-357 B.C.）的言辭，後文也指出此器乃是為了祭祀陳桓公而作，因此這段銘文正是在稱頌祭祀對象。第二部分從「其唯因齊揚皇考」開始到「合（答）揚畢德」，敘述主題是陳侯因齊對自己的期勉，期盼自己能「揚皇考」，並且繼承高祖黃帝以及齊桓（？-643 B.C.）、晉文（697-628 B.C.）的霸業。第三部分則是說明作器緣由、目的以及嘏辭，亦是銘文最常見的套語部分。從銘文性質來看，其整體結構風格與西周興盛期的銘文

下讀為「紹踵高祖黃帝」，詳見徐中舒，〈陳侯四器考釋〉，《徐中舒文史論文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432-433。其二為郭沫若認為「祖」當為動詞，有祖述之義，故「紹踵」當屬上讀，而「高祖黃帝」自成一語，並與「侏嗣桓文」為對文，見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暨圖錄攷釋〉（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頁465。本文考慮到「紹踵」一詞之意，以及戰國中晚期「黃帝傳說」的流傳情況，選擇採用徐中舒之斷句。至於「侏嗣」之「侏」，本文從裘錫圭之釋「纂」，參見裘錫圭，〈讀述器銘文札記三則〉，《裘錫圭學術文集（三）·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頁167-171。

⁶⁵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第三卷〉，頁594。

相似，應當可視為陳侯因齊祭祀先君的祭告檔案文本。

第二段銘文提及的「高祖黃帝」一詞，曾引發學界熱烈討論。學者多半認為齊威王視「黃帝」為田氏之祖，但對於齊威王祖述黃帝的心態卻有不同看法：其一認為威王宣示高祖黃帝反映了戰國中期之際政治主題正在發生的轉變即由諸侯爭霸向七國爭王的轉變，⁶⁶其所展現的相王稱霸企圖，使這段文字並非表現單純追述祖先的意志，而是突顯器主自身的政治野心。其二認為「高祖黃帝」在齊威王所屬的戰國中期，尚未有這種帝系源頭的象徵意義，而嚴密的大一統帝系也還沒有發展得如此完備。⁶⁷李瑤、孫剛在〈東周齊系金文所見古史傳說輯考〉一文指出，從〈陳侯因齊敦〉「高祖黃帝」的出現以及上博簡〈武王踐阼〉將「黃帝、顓頊、堯、舜」連稱來看，戰國中期楚地「黃帝」相關傳說已經存在，並且已經納入到古帝系統之中。可見在當時人的觀念之中，「黃帝」傳說是有著比較廣泛的影響，陳侯因齊敦銘文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將自己「虞舜」之後的身份追認至「黃帝」之後，這可能和田齊篡權以後為取得輿論上的正統地位有關。⁶⁸若是參考近年出土繁多的楚簡文獻，再考慮到古史傳說的演變進程，則可知齊威王所追述的「高祖黃帝」雖沒有帝系源頭之象徵意義，但已是齊地流傳廣泛且納入古帝系統的古史傳說，故本器祖述「高祖黃帝」

⁶⁶ 周春生、孔祥來，〈田齊「高祖黃帝」考辨〉，《浙江社會科學》2012年第12期，頁132-142。

⁶⁷ 郭永秉認為戰國時代堯舜之前的古帝王傳說系統是比較複雜的，「六帝」中除了「舜」之外，其餘人都不能確指。戰國楚竹書中有一些「黃帝」的記載。從中確實可以看出在戰國中期至晚期，黃帝已經逐漸成為古史傳說的重要人物甚至中心人物；還有材料說明，雖然黃帝、顓頊本來是上帝，並沒有時代的先後，但在戰國中期已經出現把黃帝排在顓頊之前，並將此二人作為堯舜之前古帝王的說法。必須指出，這種排列只有時代先後的順序，並沒有《帝系》所謂顓頊為黃帝孫，舜為顓頊六世孫說法的任何痕跡，因此大一統帝王世系的最終形成年代當不會早於此。論證過程詳見郭永秉，《帝系新研——楚地出土戰國文獻中的傳說時代古帝王系統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150-163。

⁶⁸ 李瑤、孫剛，〈東周齊系金文所見古史傳說輯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3年第6期，頁29-31。

之目的應仍是針對田氏篡齊一事的正當性提供解釋。

整體而論，戰國時期的「器主曰」開篇銘文並未脫離春秋餘緒，〈陳助簋〉及〈陳逆簋〉基本延續以往流行的兩段式結構與揚己主題。然〈陳侯因賚敦〉銘文雖述及皇考孝武桓公、高祖黃帝，也提到器主自身當揚皇考、踵續先祖功業，但從銘文製作動機來看，亦非器主欲將己身放置於宗族脈絡之下，以祈求宗族先祖庇佑的禱念，而是更加強調陳侯因賚的自我期勉與政治意圖，因此即便此器是孝武桓公的祭器，但銘文的敘述主題仍是陳侯因賚自己。

七、結語

「器主曰」開篇銘文作為一種紀錄形式，不僅保留了周人如何看待自身與祖先的關係，也呈現出兩周宗法制度如何從興盛走向崩解的過程。經過對兩周「器主曰」開篇銘文的歷時性考察，可對銘文與社會關係做出較細緻的分析，本文在前賢研究基礎上提出以下三點新的解釋與結論：

首先，本文針對西周前期「器主曰」開篇與其他銘文的分析比較，主張這類銘文的主述口吻不僅較完整保留作器者之立場與心境，部分銘文更因祭祀場合而展露其禱辭性質。其後隨著銘文結構與用詞的形式化，這類銘文在西周中晚期雖保留主述口吻，但內容已非儀式進行當下所使用的祭告文本，而是經過重新編寫、濃縮的版本，因此同時具備了禱辭、頌辭以及製作動機的敘述。兩周之際更產生性質的匯流，證據在於敘述性軍事銘文也出現「器主曰」開篇格式與主述口吻，而此股趨勢為春秋「器主曰」開篇銘文所承繼，最終與一般銘文合流，形成宣揚器主自身功績、紀錄器主作器緣由的紀念性文本。

其次，「器主曰」開篇銘文約在西周中、晚期發展出較穩定的結構，此時多數銘文由伐閱之辭、獻辭以及嘏辭所組成，儘管組成結構

與一般長篇銘文並無不同，然其用詞與敘述方式仍保留不少口述或主述痕跡。而春秋時期的銘文結構則有顯著不同，主要演變為兩段式結構，包含器主自報家門以及說明鑄器原由兩部分，除了以「記時+器主曰」的開篇之外，核心結構與其他銘文並無太大不同，而此種結構一路延續至戰國時期。

最後，本文認為「器主曰」開篇銘文反映兩周社會從「述祖」到「揚己」的轉變趨勢。西周時期著重從器主立場展開的內容與敘述口吻，乃是器主藉由對家族祖先功績的重塑，以確立自身的職務與定位，期盼能經年累月的保持家族榮耀；兩周之際則開始出現以「紀念自身功績」為主的內容，雖與其他主題匯流，但仍保有主述口吻以及器主心境等特殊性的影響，原來以「述祖」銘文也以明確宣告器主自身價值為中心，無論是省略述祖之辭還是自報家門格式，都僅是為了釐清器主的身分地位並襯托其政治實力而生。

整體而論，兩周「器主曰」開篇銘文不僅涉及儀式、文本乃至於記憶的形成，更隱約地透露兩周宗法制度、社會結構、精神思想的變革。從「述祖」到「揚己」的過程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個人價值如何從宗法制度中逐漸掙脫、顯現，而春秋以後形成「揚己」主題也持續影響後世，亦能以其他形式或素材不斷地被重新展演或再現。⁶⁹

（責任校對：廖安婷）

⁶⁹ 柯馬丁認為秦始皇石刻與春秋時代〈秦公鐘〉、〈秦公簋〉銘文有內在相承關係，甚至秦始皇可能將銘文視為碑刻內容的學習典範，其指出「從禮儀連續性的視角來看，我們有必要考慮秦公銘作為帝國碑銘文本典範的這種功能的可能性——這不是一種時代錯置。最後，或許秦始皇確實能夠接觸到這些秦公青銅器，這一假設可以從考古紀錄中一個細微而有意思的細節得到證實：秦公簋及簋蓋的外部，均刻有關於容器容量的簡短銘文，鑄刻時間很有可能不早於帝秦時代，甚或刻於漢代。」見〔美〕柯馬丁著，劉倩譯，《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國文本與儀式》，頁 61。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戰國〕左丘明撰，〔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春秋左傳正義》，臺北：藝文印書館，2001年，據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版影印。
- 〔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臺北：洪葉文化事業出版有限公司，2001年。

二、近人論著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釋文》，香港：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01年。
- 李瑤、孫剛，〈東周齊系金文所見古史傳說輯考〉，《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13年第6期，頁29-31。
- 何樹環，〈讀〈迷盤〉銘文瑣記〉，《文與哲》第3期，2003年12月，頁1-13。
- _____，《西周錫命銘文新研》，臺北：文津出版社，2007年。
- 周春生、孔祥來，〈田齊「高祖黃帝」考辨〉，《浙江社會科學》2012年第12期，頁132-142。
- 林宏佳，〈「尤」、「擇」辨釋〉，《成大中文學報》第27期，2009年12月，頁119-252。
- 徐中舒，〈陳侯四器考釋〉，《徐中舒文史論文選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405-446。
- 郭永秉，《帝系新研——楚地出土戰國文獻中的傳說時代古帝王系統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
-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暨圖錄攷釋》，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年。

- 張光裕、黃德寬主編，《古文字學論稿》，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
- 張政烺，〈周厲王胡簋釋文〉，《張政烺文集·甲骨金文與商周史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頁245-260。
- 陳英傑，〈兩周金文「器主曰」開篇銘辭研究〉，《西周金文作器用途銘辭研究》，北京：線裝書局，2009年，頁818-835。
- 陳劍，〈甲骨文舊釋「尤」之字及相關諸字新釋〉，《甲骨文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年，頁59-80。
- 彭裕商，〈西周銅簋年代研究〉，《考古學報》2001年第1期，頁1-42。
-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臺北：源流出版社，1982年。
- 裘錫圭，《裘錫圭學術文集（三）·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 董珊，〈釋西周金文的「沈子」和《逸周書·皇門》的「沈人」〉，《出土文獻（第二輯）》，上海：中西書局，2011年，頁29-34。
- 劉雨，《金文論集》，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
- 劉源，〈試論西周金文「帥型祖考之德」的政治內涵〉，收入王興尚主編，《周秦倫理文化與現代道德價值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頁不詳。
- 謝明文，〈晉公盞銘文補釋〉，《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第五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頁237-238。
- 〔日〕白川靜，《白川靜著作集·別卷·金文通釋5》，東京：平凡社，2005年。
- 〔日〕江村治樹，〈春秋時代青銅器銘文の書式と用語の地域別変遷〉，《春秋戦国秦漢時代出土文字資料の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2年，頁89-128。
- 〔美〕柯馬丁（Martin Kern）著，劉倩譯，《秦始皇石刻：早期中國的文本與儀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美〕羅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西周青銅銘文的性質〉，《考古學研究（六）》，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年，頁343-373。

〔德〕楊·阿斯曼（Jan Assmann）著，金壽福、黃曉晨譯，《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年。

三、網路資料

殷周金文暨青銅器資料庫網站，網址：<http://bronze.asdc.sinica.edu.tw>，檢索日期：2017年3月15日。

劉源，〈試論西周金文「帥型祖考之德」的政治內涵〉，先秦史研究室網站，網址：<http://www.xianqin.org/blog/archives/1294.html>，檢索日期：2016年10月31日。

A Study of Pre-Qin Bronze Inscriptions Beginning with “*Qizhu yue*”

Ting-Chi Huang*

Abstract

This article investigates Zhou dynasty inscriptions that begin with the phrase “*Qizhu yue*” 器主曰. It reaches the following four conclusions. First, when the inscription starts with “*Qizhu yue*,” it adopts the vessel maker’s voice and tone of expression. Second, the structure of these inscriptions became stable in the middle and late Western Zhou, and they were for the most part comprised of three components: the statement of merit, the statement of dedication and the statement of purpose. However,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d Warring States periods, they more commonly consisted of only a self-referential statement and a reason for casting. Third, although the inscriptions from the Western Zhou retain the essential qualities of prayer, considering the uniformity of their structure and content, they were more than likely not the actual ritual texts used in the rites. The ritual texts we read on the bronzes included prayer, eulogia and the motivation behind their composition, which suggests that they were recomposed after the rites were performed. Finally, the theme of the inscriptions underwent an important change, from remembering the ancestors to self-promotion in the midst of social change. In the Western Zhou, “*Qizhu yue*” inscriptions usually sought to highlight the ancestors’

* Application Project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Fo Guang University

achievements; in the period spanning the Western and Eastern Zhou they converged with other types of inscriptions, including those that extolled military exploits. These later inscriptions focused on the self-promotion of military deeds and political merit during the relocation of the Zhou royal court, a practice that reached its peak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y mention ancestors only to demonstrate the legitimacy of their power. In addition to the four points noted above, inscriptions beginning with “*Qizhu yue*” also shed light on changes in the patriarchal system, the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spiritual thought of the Zhou dynasty.

Key words: bronzes, inscriptions, “*Qizhu yue*”, texts, rites

